



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C91-52
1

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208 号

责任编辑/张国栋

封面设计/王征发

责任校对/王京丽

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

*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375 字数: 455 千

1992 年 5 月北京第一版 1992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7-81014-629-7/C·5

定价: 22.00 元



费孝通先生

DH98/19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费孝通学术精华录》，现受作者委托，更名为《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并增补了文章。此项工作难度很大，限于我们的水平，难免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年1月

自序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要我自选一些发表过的学术文章编成一集，收入他们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我受宠若惊，不敢承允。我固然写过不少文章，也自认为是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但是“当代名家”的称号实在当不起。我的作品内容很杂，挑来挑去也选不出可称得“精华”之作。这点自知之明，我是有的，原不应滥竽充数。但还是拗不过出版社执意之约，多次辞谢不果。编成之后，心里还是不安，想在书前略表衷思。

为了要我自选，我不得不把曾发表过的作品，凡是手边能找到的，翻阅一遍。我看到我写作的时期实在不短，前后已有六十四年。最早的作品是1924年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的“少年文艺”，后来还写过一些童话。我又看到我虽没有走上文艺这条路，但早年的写作却养成了我写杂文的爱好。

1930年我才进入社会科学的园地。可是我

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安心在划定的学科的范围里活动。按传统的学术分科来说，我是脚踏了两条船，一是所谓社会学，一是所谓人类学。人类学实际上已越出了所谓社会科学的界限。我不管这一套，认菩萨不认庙。我这五十多年来认定一个主要课题，就是认识中国社会情况。这个“越界”问题在国内并没有引起什么麻烦，在十年前曾有一段时期反正都是一窝里的货，全被端走了。最近这些学科恢复了名誉，界线何在颇费周章。有些出版社想出版我的文集，由于跨界，只能把我的作品掰成两半，一属东家，一属西家。一家出了我的《民族研究文集》，另一家出了我的《社会学文集》，使我很为难。这本书以社会科学为范围，免遭此劫。

但是问题还是有。我这些作品里那些够得上“学术”的规格？在当前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讲“规格”的社会里，这个问题要丢都不易丢得开。我所发表过的文章里有不少是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算不算学术论文想不到曾经成为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甚至有一家自称是社会科学的专门杂志认为，社会调查“没有理论”，不应闯进“学术”的堂奥。幸亏我老了，不求什么职称，否则我也就会轮不到提升了。

其实怀疑我那些作品能不能进学术庙堂的，并非今日始有。原因是象我这样“做学问”

的人在中国历来是不多的。一不善于引经据典，排列数字，二没有深奥难懂的行话专词，三不说教立说。我主张要写看得到的事实，多想想这些事实的意义，有什么体会就说什么体会。所以我下笔不讲求形式，也不愿受格律限制。这些使道貌岸然的学者看不入眼是可以理解的。

我那种有话就写，即兴成章的习惯当然有它的缺点。没有经过反复考虑的思想，总容易有片面、失实、甚至错误的地方。但这已成了我的积疾，几十年来还是难改。这种习惯很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形成了我写作的风格。说是和性格有关，因为我记得在小学里，为了考试时抢交头卷，常看到老师对我无可奈何地摇头。交头卷有什么好，自己也不明白，但只要看见有人在我前面交了卷，我就急了，从来就是个宁可少得分数，也捺不住多看几遍，改正些错字。不仅幼年如此，到了中年，听到人家说我“快手”，心里就得意。我也明白这不一定是褒词，快不一定好，甚至一定会在好字上打折扣。但积重难返，老来还是没有耐心，不写手痒。

我说这段话，是想为我只能写短文，长篇写不好的风格找个理由。我回头看我所发表的作品，除了几本调查报告外，没有写过大部头的书。即使象《生育制度》、《乡土中国》这类

需要较长篇幅才能把自己思想发挥清楚的书，我也是长篇短写，分成许多小题目，一篇一篇地写成的，有点象现在电视里流行的连续剧。至于访问记一类的作品，更是如此了。甚至近年来有关小城镇和边区开发的研究还是采取了系列化的形式来发表的。我写文章已习惯于一气呵成，过去年轻时是文章不过夜的。这样写，也有好处，文思连贯，笔调畅顺，坏处就是难于周到求全，失之于偏畸。

养成这种习惯也有我处境的客观条件。我写作旺盛时期是在三十岁前后，正是抗战年头。那时我在后方云南昆明，一面在学校里教书，另一面由于收入太少不够养家，不能不另谋第二职业。而我除了一支秃笔之外，并无所长。所以从四十年代开始，直到解放，我不能不靠卖文为生。我不会写小说，只能写短文过日子。最困难时，我在云大校门口的茶馆里摆过摊子，等人来约稿。昆明报纸是我的顾客。我只把住一条，按自己要说的话写，愿买者不拒，稿出不留底，很多不具名，现在已难收集了。

我又和若干刊物有长期供稿的特约。比如，从1947年起，《观察》几乎每期有我的文章。那时伦敦援华会的朋友每周寄我重要报刊的航空版。我掌握的信息比别人灵快，每周写不署名的译稿，反映国际舆论。还写过《炉边天下》，

引起国际新闻界的注意，称我作中国的专栏作家。其实这只是我的副业。当时我除了需要稿费补贴家用外，我也发生了政治上的兴趣，因而得到了“民主教授”的称号。我这里要问的，这些算不算学术文章呢？答案并不那么容易。如果不算，那么我的“中国士绅”那一系列文章，经人翻成英文，至今在国外的某些大学里还在用作课本，这又怎么说呢？如果这一系列算，凭什么说“炉边天下”不算呢？这些还不是当时的国际政治的分析？

话又说回来，我这些作品反正和当时甚至目前被认为是学术论文的是有区别，不仅形式不同，本质也不能一样。究竟应当怎样评估，我想还是留待后人去说的好。我反正已经年迈，要改变已经不容易了。我还是本着说真话，写容易读的东西就是了。我行我素。

本来我可以不必去牵出这些问题来麻烦自己。我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那里还有工夫去花那些口舌。只是因为要“自选学术精华”，不想明白了，难于取舍。想明白是困难的。我只好这样办：那些我自认为比较写得分量重的调查报告，由于篇幅太长，不合丛书规格，就不去考虑了。还有那些游记体裁的杂写，抒情甚于载道，离一般所谓学术看来是远了些，不妨割爱。这两头一切，留下的我自己看来都是平平的，说是“精华”实在有点寒酸。但是我

有什么其他选择呢？既要成全出版社的善意，我只能担当敝帚自珍之嫌了。

当我把这本稿子送出门时，心里并不怏然，总觉得做了件不太惬意的事。就让我把这心情写在纸上来结束这篇前言吧。

1988年1月7日于香山饭店

目 录

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	1
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	12
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	24
同社会学界朋友们的谈话	34
《社会学文选》序	41
《江村经济》著者前言	48
《江村经济》前言	53
三访江村	58
九访江村	77
江村五十年	102
《云南三村》序	118
小城镇调查自述	127
小城镇 大问题	141
小城镇 再探索	189
小城镇 苏北初探	212
小城镇 新开拓	251
温州行	285
淮阴行	305
盐滩行	316

闽东行	323
苏南行	336
乡土本色	350
差序格局	357
礼治秩序	366
长老统治	373
血缘和地缘	379
《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	389
《盘村瑶族》序	394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411
赤峰篇	426
包头篇	458
定西篇	477
甘南篇	497
临夏篇	523
悼福彭	539
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	542
曾著《东行日记》重刊后记	551
怀念母校	562
我看人看我	566
《美国和美国人》旧著重刊前言	573
武夷曲	577

	3
两篇文章	584
海南曲	593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自记	598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602
四年思路回顾	646
学历自述	685
主要著作目录	695

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为了要开展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去年春天曾召开过一次座谈会，由于当时很多参加座谈的人对社会学还是心有余悸，没有谈出结果来。今年春节期间又谈起要成立社会学研究会的问题，并约定开一次成立大会，在会上要我作一次发言，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讲一讲为什么我们还得搞社会学？怎样着手搞社会学？我同意这确实是当前应当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并且觉得有责任发表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可是，当我打算下笔写发言时，却很为难。20多年来，我没有提过这门学科，国内也没有人敢再提了。对这门解放初期就被撤消、1957年又被打入禁区的社会学，叫我从何说起呢？

我正在握笔发愁，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找到了我的门上。他一见我伏在床边的小桌上写稿，床上堆满了杂乱的书籍纸张，就想起了几十年前我们在中学时宿舍的情景，不禁哑然失笑，说：“你怎么还在闹住宅问题？”我告诉他说：“实不相瞒，这是被我的第三代挤得这样的。老伴有病，把女儿一家调回来照顾她，人多了，空间就少了，

还不该让点地方给新生的接班人！”他点头就说：“人口问题，还是不容情的吧。”突然他问起我以前写的《生育制度》那本书，能不能借给他重新看看。接着他又讲了一段家常。他原来同儿子住在一起，可是老伴和儿媳相处不好。后来儿子调往外地，他和老伴跟女儿一家同住，才算解决了“家庭问题”。但最近他儿媳生了个娃娃，夫妇双职工收入有限，当地托儿条件不便，雇人又雇不起，急得没办法，来信求援，看来还得把娃娃送回来，今后麻烦事可又少不了。所以他想起我那本旧著来了。

最后，他很有感触地说：“这不是我们一两个人的问题，是社会上很多人的共同问题呀！看来都是些小事，我们这些书生过去都不愿谈论的生活琐事，现在却成了四个现代化的不小的障碍。这些啰嗦事拖住了不少人的后腿啦！”似乎这些问题该我负责似的，他盯着我的眼睛说：

“你不是搞过社会学的么？你得说说这些社会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才是。”我顺口说：“没有调查，那里有发言权呢？”他紧接着似乎在责备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去调查调查呢？”

这位老同学的责难开了我的窍。为什么还得搞社会学和怎样着手搞社会学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已经给他一语道破了么！

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人和人在一起生活，总免不了有矛盾。这些矛盾有不同的性质，有不同的原因，也应当采取不同的办法去处理。生活在这些社会里的人，感到问题存在，需要解决，但不一定都明白这些问题属于那种矛盾，

怎样对付才是。

在悠久的历史时期里，人们是在“试验—错误—再试验”这个公式里进行生活，付出很大代价，从正反的经验教训里积累一些比较妥善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然后作为传统保存下来。社会又不依人们的意志继续在发展，旧的传统解决不了新的问题，需要不断付出代价积累经验。总之，人类的社会生活曾经长期在必然王国里翻腾，演出多少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而没有觉察到社会的变化和自然界一样也有它的客观规律。人类终于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要按照客观规律处理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道路上的重要步骤。我那位老同学责备我为什么不通过调查研究提供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客观依据，实质上就是这种自觉的表现，要求我们用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问题。

好事多磨，道路曲折。我不由得不想起一些往事。解放前，我们这些学过社会学的人虽然有志于用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问题，但由于受各自阶级和教育的影响，又缺少马列主义的学习，实际上缺乏真正的科学态度。在旧中国反动统治下，开展社会学的研究是很困难的，要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限制，我自己在从事社会调查时就经受过重大的创伤。那时候即或有的人或有的学校做过某些社会调查研究，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提出过一些看法，总不免受到立场、观点、方法上的局限。解放后，绝大多数从旧社会来的搞过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人都衷心地希望在党的领导下，学习马列主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改造这门学科，以达到能开展适应新中国需要的社会学研究，进行一些社